

雷颐 著

历史的进退

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



历史无声
往事留白
看不清的现代中国
不能承受的回忆之轻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

历史的进退

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 雷颐 著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桂林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史的进退: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/雷颐著. —桂林: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. 1

ISBN 978-7-5633-7974-3

I. 历… II. 雷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200815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(网址:www. bbtpress. com)

出版人: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(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45 号 100071)

开本:690mm×960mm 1/16

印张:18.5 字数:200 千字

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 001~8 000 定价:2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帝国斜阳

同文馆之争——“特殊性”与“普适性”的初次激辩 / 3

“柔远”与普世价值 / 9

为清廷打工的美国外交官 / 14

被打出来的“海军司令部” / 21

天津教案的隐喻 / 27

晚清的两次“行政改革” / 34

何以“激进” / 41

清廷“制造”革命党 / 48

今昔人物

李鸿章的最后时光 / 55

吾爱孔子，吾尤爱真理 / 66

梁启超与哈耶克 / 71

莫把讽刺当赞扬——李大钊曾赞扬辜鸿铭？ / 76

“不采蘋花即自由”的意义 / 80

“还我头来”陈虞孙 / 84

“疑”重于“信”张中行 / 89

一身跨两代——阅读陈乐民 / 94

不是故事

目 录

公园故事 / 107

“万岁”故事 / 115

“声音”故事 / 125

麻雀故事 / 133

层层剥笋法 / 141

可如实回答 / 145

早请示，晚汇报 / 149

曾经这样“表演” / 154

轰动全国的“芦苇” / 158

“军”、“队”的命运 / 163

避免体制性荒诞 / 168

“突出政治”变形记 / 172

“文革”三震与汶川之震 / 181

通海地震与刘心武的“亏心事” / 192

真正属于自己的歌 / 196

电子音乐小风波 / 201

后现代批评与中国国情 / 206

公共空间

最怕无社会 / 215

矿难与工会 / 219

“社会”与“社会和谐” / 225

交通拥堵与公共空间分配 / 228

从恒和的信用说起 / 232

“帝国民主”的结局 / 236
西南联大传奇的生成与接续 / 248
大学的学术标准与自主性 / 252
尽管言“汉”，未可称“国” / 256
漂亮的脸蛋与大米 / 259
《越狱》背后 / 263
语言冲突与社会鸿沟 / 266
“和平大战”与“和平崛起” / 270
刘翔退赛与体育话语的转变 / 278
后 记 / 281

帝国斜阳

纵观晚清历史，每当还有一线希望、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，清廷总是拒不变革；只到时机已逝、完全丧失操控能力的时候，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『变革』。改革愈迟，所付出的『利息』也将愈大。但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，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，而且拒不『付息』，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，步步被动，一拖再拖，一误再误，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，始终是被形势推着走。这样，它后来便不得不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，直到完全破产。

同文馆之争

——“特殊性”与“普适性”的初次激辩

近代中国要自强自然要“师夷长技”，要学习外语和声光电化船坚炮利等自然科学知识。但中国传统是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，只有苦读圣贤经典、寻章摘句、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“正途”，而“技术”一直被视为“雕虫小技”甚至是“奇技淫巧”。换句话说，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，儒学经典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，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，几乎不被看做一种“合法”的知识。但在外国船坚炮利的现实面前，洋务派不得不“低头”，提出要学习外语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，并创办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文馆。但新知识依然没有地位，愿学者寥寥无几。

为改变这种状况，总理衙门王大臣奕訢等于 1866 年底上奏提出要招收“正途”出身人员学习声光电化、天文算学，想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。他们预料到顽固派会坚决反对，所以在奏折中说：“论者不察，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，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，甚且有以中国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，此皆不识时务也。”他们详细说明了学习西法的重要性，指出当今既欲讲求制造轮船、机器诸法，如不借西人、西法为先导，探求机巧之原、制

作之本，结果必然徒费金钱，无实际效果。他们特别驳斥了那种以“师法西人”为耻的荒谬论点。奏称：“天下之耻，莫耻于不若人。”“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，学其文字，究其象数，为仿造轮船张本，不数年亦必有成……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，不思振作，耻孰甚焉！今不以不如人为耻，而独以学其人为耻，将安于不如终不学，遂可雪其耻乎？”他们明确提出学习西方是为了“雪耻”，拒绝学习西方才是真正的耻辱。

同文馆拟添设天文算学馆并招收科甲正途人员的消息传出后，激起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。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折提出反对意见，认为若求自强，在朝廷则莫如“整纪纲、明政刑、严赏罚、求贤养民、练兵筹饷”等，对臣民则只有讲求“气节”，依靠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泽，以尧舜孔孟之道进行教育和帮助。

张盛藻地位、名望毕竟不够高，顽固派中权势最大、声望最高、管理户部（即全国财政）的文渊阁大学士倭仁于是亲自出马，递上“立国之道，尚礼义不尚权谋；根本之图，在人心不在技艺”的奏折。他认为天文算学为益甚微，不过是“一艺之末”，而正途人员奉夷人为师，所造就者不过是“术数之士”，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够起衰振弱的。“天下之大，不患无才，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，博采旁求，必有精其术者。何必夷人，何必师事夷人？”他又说：目前世道衰微，礼崩乐坏，唯有依靠读书之士讲明义理，或可维持人心，如果科甲正途人员“变而从夷”，正气为之不伸，数年之后，“将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”，所以请求朝廷立罢此议。倭仁是公认的理学大师，言辞更具煽动性，在士大夫间形成一股反对学习西学的强劲力量。

对此，奕訢等人上折反驳说，倭仁之论“陈义甚高，持论甚正”，他们在没有办理洋务之前，也是如此见解，但现在他们不敢

像倭仁那样一味“空言塞责，取誉天下”。他们认为，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、讲求机器制造之法、教练洋枪队伍、派人出国考察等，“凡此苦心孤诣，无非欲图自强”。目前奏请开设天文算学馆，实为制造轮船及各机器的基础，并非“空讲孤虚，侈谈术数”。他们指出，洋人敢入中国肆行无忌者，缘其处心积虑在数十年前，凡中国语言文字，形势虚实，一举一动，无不周知；而洋人之举动，我们则一无所知，徒以道义空谈，纷争不已；现在设法了解洋人自强之方，却议论纷纷，一误何堪再误！他们指责顽固派“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，以为不必学；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，以为不能学”。他们在奏折中还将了倭仁一军：既然倭仁认为决不应设立天文算学馆，自必另有计谋，如果他确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，他们自当追随倭仁之后；如别无良策，仅以忠信礼义为武器，以为这就可折冲樽俎，足以制敌之命，“臣等实未敢信”。

倭仁当然不服，再次上折，依旧强调自强之道在于朝廷“用人”与“行政”，所以设立同文馆实为多此一举。

为使清廷鼓励正途出身人员报考，奕訢等人再递上折、片各一件，进一步阐明学习西方的必要性，强调如仍苟且偷安、不思振作，后患将不堪设想。他们斥责倭仁以“道学鸣高”，故意危言耸听，总以“师事夷人”、“奉夷为师”指责别人，其目的无非是阻止人们报考同文馆。他们声称，同文馆雇觅洋人不过是讲授天文算学，早已奏明入馆学习者不修弟子之礼，该折业经发抄，倭仁岂有不知？为什么信口开河，肆意攻击？他们继续将倭仁的军：倭仁不是认为中国早有精通天文算学、船坚炮利的人才，只是没有精心访求吗？他们于是提出希望朝廷下旨饬令倭仁保荐数人，即行择地另设一馆，由他督饬。清廷还真接受了奕訢等人的请求，发布“上谕”，要倭仁保荐几名精通

天文算学人才另行择地设馆，由倭仁负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倭仁不得不承认“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，不敢妄保”，请求不必另行设馆。但是，他仍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，认为天文算学只为最不重要，“并非欲自强必须讲明算法也”。

在奕訢等人的策划下，清廷任命倭仁在总理衙门行走，想逼使 he 也不能不涉及洋务。但倭仁表示坚辞，未获批准，便称病乞假。

当倭仁在洋务派的步步进逼下处境十分尴尬的时候，候补直隶州知州杨廷熙通过都察院递上《请撤销同文馆以弭天变折》，以“天象示警”来为顽固派辩护。他指说今年春季以来久旱不雨，疫病流行，是“天象示警”，“京师中街谈巷议，皆以为同文馆之设，强词夺理、师敌忘仇、御夷失策所致”，认为总理衙门请求设立同文馆是“不当于天理，不洽于人心，不合于众论”，“溃夷夏之防，为乱阶之倡”。为了“杜乱萌而端风教，弭天变而顺人心”，必须“收回成命”，将同文馆予以裁撤，或者禁止科甲正途人员报考天文算学馆。他认为中国欲求自强，只需要“纪纲立，号令行，政教兴”，“作忠义之气于行间，尽教养之怀于民上”，则洋人虽众，枪炮虽利，轮船虽多，亦断不敢肆虐于中国。他强调西方国家乃中国之“敌国”与“世仇”，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就是“师事仇敌”，“无论偏长薄技不足为中国师，即多才多艺层出不穷，而华夷之辨不得不严，尊卑之分不得不定，名器之重不得不惜”。而科甲正途人员一旦使之师事仇敌，则“忠义之气自此消矣，廉耻之道自此丧矣，机械变诈之行自此起矣。圣贤之大道不修，士林之节概不讲”，后果非常可怕。他把西学视为洪水猛兽，宁可使中国落后挨打，也决不可向敌人学习。杨廷熙自恃有倭仁为后台，又掌握儒学正统“话语权”，所以在奏折中还肆无忌惮地攻击总理衙门诸大臣，甚至直接涉及清廷最高统治者：“西教本不行于中国，而总理衙门请皇上导之使行”，该衙门大臣“专擅挟持，

启皇上以拒谏饰非之渐”。

顽固派不仅从抽象的理学角度反驳洋务派，而且把主张学习西方者扣上了“师事夷人”、“奉夷为师”、“师事仇敌”等类似于“里通外国”、“汉奸”等政治性大帽子，在近代中国屡被侵略的背景下，这种言辞更易激起人们的义愤。

最后，奕訢等人只能以自请“开去总理衙门差使”相挟。看到两派势同水火，争论愈演愈烈，继续下去将使朝政瘫痪，清廷便于1867年6月30日发布“上谕”，一方面严批杨廷熙、倭仁等人，一方面又以“与国家休戚相关”为由，要倭仁“不应坚持己见”，与总理衙门王大臣等“和衷商酌，共济时艰”，同时饬令奕訢等应“不避嫌怨，力任其难，岂可顾恤浮言，稍涉推诿”。这场争论遂告结束。

这次历时半年激烈争论的结果，双方各有得失。顽固派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的企图毕竟没有得逞，就此而言，洋务派胜。但在顽固派的影响下，报考同文馆的人数锐减，特别是正途出身人员依然寥寥无几。顽固派的主张在社会上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，形成一股相当强大的舆论力量，“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，约法阻拦，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”。名士李慈铭在日记中就写道，“正途”人员学西学是“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，稍有人心，宜不肯就，而又群焉趋之。盖学术不明，礼义尽丧，士习卑污，遂至于此。驯将夷夏不别，人道沦胥，家国之忧，非可言究”。一时还出现不少对联：“诡计本多端，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；军机无远略，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。”“未同而言，斯文将丧。”“孔门弟子，鬼谷先生。”还有作俚语笑骂的，如“胡闹，胡闹！教人都从了天主教！”人言籍籍，群起非难，报考天文算学馆的人数更少。总理衙门1867年7月初奏称，“两月以来，投考之人，正途与监生杂项人

这次争论的实质，是西学的价值问题，亦即自然科学知识是否具有“普适性”。任何一种知识都产生于具体的“地方”，所以每种知识的源起都具有“地方性”，如果因此认为任何知识都没有普适性，那么所谓交流、交往将没有意义，不同文明之间根本无法沟通，人类也不可能发展进步。发端于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在引入中国之初被称为“西学”，表明时人认为这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。顽固派坚决反对引入，即认为这种知识不具普适性、不应为“我”所有，而且是对“我”构成威胁的“他者”。洋务派虽不可能清晰认识到，自然也未明言这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知识，但强调能为我用，毕竟是对其普适性的初步承认。声光电化、天文历算这类知识从“西学”到“科学”的名称之变，实即“身份之变”，表明近代中国最终承认这是一种普适性知识体系。现在，科学更是被提高到“科教兴国”的高度。中外历史表明，国之兴衰、社会发展之快慢，与对这种普适性知识接受的难易确实大有关系。

“柔远”与普世价值

“柔远能迓，以定我王”，语出《诗经·大雅》；“柔远人，则四方归之”，则是孔老夫子的教训。几千年来，“柔远”、“怀柔”成为中国统治者理想的驭外、安抚四方狄夷之术。不过何为“柔远”或“怀柔”，则圣人语焉不详，于是后世帝王对“九夷八蛮”或抚或剿、或和或战都统称“柔远”或“怀柔”，因中国是“礼义教化之邦”，所以对狄夷的抚、剿、和、战，统统都是“宣我圣教”，“布我德威”。更广泛些说，因中国是位于“天下之中”的“天朝上国”，其他都是蛮夷之邦，因此彼此所有关系在时人眼中都只能是华夏的“柔远”，而无所谓“中外关系”。

这样，近人王之春以编年体形式综述清代自顺治元年（1644）到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间中外交涉和与边远少数民族关系的史书，就理所当然地名之为《国朝柔远记》（亦名为《清朝柔远记》）。王之春，字爵棠，亦作芍棠，湖南清泉（今衡阳）人，清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生。他早年入彭玉麟幕，后曾随曾国藩、李鸿章等转战各地，以“文人兼武事”的才干受到称赞和重用，历任浙江、广东按察使，湖北、四川布政使，山西、安徽、广西巡抚等职。这种经历使他不能不对“夷务”（后称“洋务”）格外关心留意，大约于光绪五年（1879）撰成此书。

他在“自叙”中坦承编撰此书的目的是详述有关大小历史事

件，互证彼此得失，希望以此得消除隐患，使朝廷能够控制狄、夷，或许有益于国家的长治久安。然而，其完整的刻本迟至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才问世，据他说本意不过是自己备忘之用，而未敢问世。然而由于向他借阅者越来越多，应接不暇，于是决定刊刻发行。不过，真实原因可能是这类介绍外国的书在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不仅不受重视，反而受到抵制，到90年代风气变化，他才敢全本付梓。全书共十九卷，跨度二百三十年，但从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至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虽才三十五年，这后三十五年却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，可见鸦片战争后这三十五年间的“柔远”远胜于此前的一百九十五年。

不过问题便由此而来：在前一百九十余年间，我中华“天朝”对“外藩”的政策是，如果它对天朝俯首称臣，自然优待；如果它气焰嚣张、不服“天朝”的管，“则罚灭之”，在理论上无论是优待还是罚灭，都可说是“柔远”；而后三十余年却是国势凌夷，列强侵逼，割地赔款，丧权辱国……所有这些明明是被人蹂躏，如何能说是“国朝”的“柔远”呢？对此，书前彭玉麟、谭钧培、卫荣光、俞樾、李元度等人所作之“叙”却有详细的分说，读来饶有趣味。

王 彭玉麟为湘军勇将，武功赫赫，但他在“叙”中却用《尚书》中的理论，说只有“柔”才是最完美的“不易之经”。因此，只有自身的“柔”并不够，而且要以“柔”让别人归顺自己，以自己的诚信使归附者也变“柔”，就是以“柔”制胜，所以要推崇的，是以和顺可亲来感化狄夷的“犷悍桀黠”本性。读完这本书，他“穆然仰见列祖神宗声教”传到全世界，不禁盛赞“盖自文、武以后，柔远之政未有若是之尽美尽善、可以行久远而无弊者”。自周文王、周武王之后，中国历朝历代的“柔远之政”竟没有如晚清“尽美尽

善”者！不过，他只是自说自话地泛泛而论，并未论证为何遭受列强欺凌以来的柔远之政是超过文、武以后的“尽善尽美”之政。

对此，曾任云南巡抚的谭钧培在“叙”中则明确用《易经》中“惟圣知几，亦惟圣因天”、“知几其神乎”的理论，说早在康乾时期，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就看到“天”要合四海为一家的端倪了。所谓“几”是指事物运动微弱的苗头，只有圣人才能洞察。也就是说，中国遭列强欺凌的实质是“天之欲合四海为一家”，康乾盛世时“天下承平”的中西交往只是这种四海一家的开始，康熙、乾隆才刚刚有所觉察，而外患日甚的咸丰时期却是“天”要中国降服狄夷的正式过程。道光、咸丰年间虽然列强不断入侵，京师曾为英法联军攻克，皇家园林圆明园亦为其焚毁，但若对此作深刻细致的研究，这恰是上天赐给的由中国来同化世界的良机，这部“柔远”记述的便是“四方”归化“中国”的历史，所以其意义不下于《左传》。

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的闭关状态，使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。面对此一局面，曾任江苏巡抚的卫荣光则从“历史”中寻找根据，认为今日的列强就是昔日《禹贡》、《周官》中所说的“九夷八蛮”，仍是中国属臣。在他的论述中，列强之所以要以坚船利炮翻山越岭、跨洋过海一路打来，原来是为“我朝”圣主的道德、声望折服，都是来接受指教，将要仿效中国“德政”的，于是则四海一家，“如天君泰而百体从令”。列强，竟是为听从“天朝”君王的命令而来！

俞樾是晚清著名学者，他认为此书意义深远，读后不禁叹服“天道”宏伟、覆盖一切，“而我国家所以长驾远馭、陶六合为一家者，其将在此乎！”他更是断言当今世界分为五大洲即印证了中国上古的“大九州”之说，但推出上古的“大九州”并不是他的目的，他的目的是要说明在神农氏以前，世界/天下是由中国统治的。